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实践探析

——以刘伯承与彝海结盟为例

李珂,施文会

(昌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昌吉 831100)

[摘要]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系统开展少数民族工作、践行民族平等纲领的关键历史阶段。彝海结盟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化解民族隔阂、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西南地区实际相结合的早期成功实践。长征进程中,刘伯承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深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以平等包容的态度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打破历代统治者长期制造的族群壁垒。这份源自革命实践的治理经验,也为新时代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长征时期;刘伯承;彝海结盟;党的民族政策

[作者简介]李珂(2007—),女,河南驻马店人,昌吉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文学学士,研究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施文会(1992—),女,河南驻马店人,昌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2025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新疆高校思政课讲好新疆故事的方式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5JDSZK183)。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5002>

[中图分类号] D23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6月在青海考察期间,当谈及长征路上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饱含深情地说:“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战略远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区域开展群众工作、检验民族工作纲领的重要历史进程。1935年5月2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挺进四川凉山境内,紧随其后面临紧迫的军事形势与尖锐的族群矛盾相互交织的局面。刘伯承作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始终贯彻党中央民族工作部署,历经波折促成彝海结盟,保障红军的顺利北上,为后续的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次彝海结盟不仅是一场保障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更是近现代中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实践样本。

一、历史境遇:红军途经凉山彝区的多重现实挑战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迅速向大渡河方向推进,能否顺利穿越凉山彝区(今凉

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乡),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避免重蹈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历史覆辙。彼时凉山彝区社会环境复杂,多重现实矛盾叠加,一方面历代封建王朝以及民国地方军阀长期推行民族歧视、武力征剿、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彝族民众在长期遭受掠夺与压迫的环境背景下,对“借道过凉山”的红军武装队伍形成强烈戒备心理,封闭排外的普遍心态成为红军通行彝区的巨大阻碍。另一方面国民党重兵持续尾随追击,一旦红军与彝族群众爆发武装冲突,不仅延误北上行军时机,更会陷入腹背受敌的战略险境,而且诉诸武力违背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革命纲领,在军事战略层面同样不具备可行性。与此同时,红军内部还面临着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的现实考验。多数红军战士长期活动于汉族聚居区域,对彝族社会家支结构、风俗习惯、族群矛盾也缺乏充分认知,一旦彝区问题处置不当,极易引发族群冲突,加大红军突围的阻力。如何在复杂彝区妥善处理民族

关系,由此成为刘伯承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

二、斡旋实践:刘伯承主导彝海结盟的史实考察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红军若要顺利地途经该地完成转移,一定要取得当地首领的支持和信任。刘伯承作为先遣队司令员严格遵循中共指示:“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去与彝民达成友好”。根据凉山彝区现实灵活施策,稳步促成彝海结盟的顺利实现。

(一)严明部队纪律,摒弃旧式民族压迫思维

红军到达县城后废除了国民党对彝族实行的“坐质换班”的压迫制度,并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反复宣讲党的民族平等、驱逐军阀、实现自由等观念,在彝区产生积极的影响。当部队翻越额瓦垭口时,后方部队被彝族武装(罗洪家支)缴械并要求红军退回到大桥时,刘伯承下达命令:“对任何形式的侵袭,都予以还击,让懂彝语的向导给彝族做宣传解释,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各族人民打天下的,此次只是借路北上的,决不会与彝族人民为敌。”面对彝族民众抢夺物资的行为,部队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严禁随意开枪还击。红军表现出的组织纪律性与过往军阀武装蛮不讲理的武力镇压形成鲜明对比,用实际行动展现红军与旧式军队的本质区别,初步消解彝族家支头领和族人的抵触情绪。

(二)放下武力威慑,构建平等双向沟通渠道

在获悉彝族果基(沽鸡)家支首领小叶丹愿意开展谈判后,刘伯承摒弃居高临下的谈判姿态,轻装简从前往会面。会谈前,小叶丹、沙马海子按照平时彝人见汉族官员的习惯取下头帕准备跪下向刘伯承行礼时,刘伯承一边说别这样做,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一边制止他们下跪。会谈之中,刘伯承对小叶丹说,汉族和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他向小叶丹清晰阐释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系统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抗军阀压迫的政治主张并明确向彝区群众承诺红军无意占据彝区、不侵扰当地民众。这场对话摆脱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模式,建立在族群双方平等的基础之上,也为双方建立政治互信奠定基础。

(三)尊重本土民俗传统,拓展多维度民族团结实践

小叶丹答应和刘伯承洽谈正是地方彝汉关系紧张之时,小叶丹还是抱有疑惧的顾虑,他在路上特意嘱咐随行的毕摩沙马海子去捉一只鸡,表示“如果说合了,要用一只鸡吃血才放心”。在彝海见

到刘伯承,小叶丹提出要按照彝族习俗同饮鸡血酒,对天盟誓,结为兄弟,两人随后各自饮下淋漓了同一份鸡血的血水,以歃血结盟仪式确立盟约。刘伯承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交往习俗,“刘伯承捧起盛有‘血酒’的茶缸,坚定、诚实、洪亮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果基约达今天在这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悔,天诛地灭!’誓罢,喝了茶缸里‘血酒’的一部分”。彝海结盟用喝血酒这一宗教仪式,确立双方骨肉弟兄关系。结盟仪式后,红军释放了关押在牢狱中的“质彝”;焚毁了反动政府剥削压迫各族人民的田赋粮簿等文书档案;建立入川之后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查抄土豪的浮财分给贫苦农民;以公平买卖的原则,向群众筹集物资,按时归还向群众借用的物品等措施积极开展彝汉统战工作,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开展群众工作的实践智慧。

(四)着眼长远革命发展,培育少数民族革命力量

缔结盟约之后,刘伯承协助小叶丹组建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授予军旗、配发武器,选派部分干部协助队伍建设,也竭力调解彝汉之间与彝族内部的各种矛盾。彝族青年踊跃投身革命洪流,积极参军入伍并参与长征行军。红军撤离彝区之后,当地彝族民众自主接续斗争,持续开展地方性的革命抗争活动。这一结盟的长远意义在于积极的动员彝族群众投身反抗封建军阀压迫的革命斗争,在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播撒革命火种,凝聚各族群众并肩作战的共同革命目标,推动各民族从情感认同走向行动层面的团结协作。

三、内涵探析:彝海结盟蕴含的“三交”实践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彝海结盟并非单纯战时应急策略,而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解决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的一次成功的本土化实践,既构建了中共与彝族群众间的互信,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广泛交往:生存相依催生利益合作共同体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到达凉山彝区的冕宁县泸沽镇,面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强渡大渡河的战略任务。此时国民党调集重兵四面围堵,企图将红军围困于大渡河南岸,复刻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对于绝境中的红军而言,突破封闭陌生的彝区、打通北上通道、保存革命

有生力量,是关乎党的生死存续的核心议题,更是为了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之目的。而彝区道路闭塞、家支林立,长久以来彝汉之间隔阂深重,若无本地彝族群众接纳与引路疏通,红军难以快速穿越百里彝区。与之相对,近代以来凉山彝族民众长期深陷艰难的生存困境。长期的封闭排外、战乱冲突、民族歧视造成彝区经济凋敝、族群孤立,如何摆脱军阀压榨、获取安稳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是当时全体彝族群众最迫切的现实诉求。正是基于双方高度契合的生存危机与发展诉求,红军与凉山果基彝族部落开启跨越族群的正式交往。为了做好通过彝族聚居区的准备工作,红军总政治部提前发布《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明确地提出:“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红军进入冕宁县城后,第一时间释放监狱关押的“质彝”、焚毁田赋粮册、张贴《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彝民宣告“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的平等主张,以实际行动消解彝民长久以来对官军的戒备与敌视。面对途中不知红军政策的彝族武装试探性袭击时,红军始终恪守纪律不予还击,安排彝语向导开展沟通接触。小叶丹通过多方打探确认红军与欺压彝民的旧军队截然不同,本着彝族固有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愿与红军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结盟之后,红军部队再见果基家支的彝民时,发现他们“已同昨天完全不同了,好像已经是自己的人一样了”,无论老幼都来接近红军,“不像昨天那样害怕我们了”。小叶丹带领部落民众为红军疏通山路、引路导航。红军也坚决站在彝族群众一方,抵制地方军阀的欺压掠夺,扶持彝族本土武装力量发展。这一阶段的广泛交往立足于现实生存需求,构建起朴素坚实的生存利益共同体,双向依存的现实联结打破彝汉长期对立、零和博弈的僵化格局,为更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二)全面交流:思想认同构筑政治互信共同体

生存层面的利益互助能够解决短期现实困境,但仅靠利益维系的民族关系具有临时性、脆弱性的弊病,无法形成稳固持久的民族联结。彝海结盟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上短暂的民族互助行为,核心在于双方在交往基础上持续开展全面交流,完成思想认同重塑与政治组织共建,实现从临时利益互助向稳固政治同盟的进阶升级。在过境彝区全过程中,红军以开展真诚务实的群众工作为依托,向彝族上层首领与基层民众系统宣讲党的民族平等思想、反

帝反封建革命宗旨与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理念,让长期被主流社会排斥、被反动政权压迫的彝族群众,清晰区分旧式军阀的压迫本质与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彻底颠覆“汉官皆欺压”的固化族群认知。作为首领的小叶丹在思想认知上也突破世代沿袭的彝汉对立思维,坦言“只有共产党和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我信得过”。这是彝族首领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纲领的认可。

彝海结盟仪式结束当晚,刘伯承设宴款待小叶丹叔侄,劝导彝族内部停止械斗、彝汉同心对抗军阀;同时正式组建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授予制式革命队旗、配发军械物资,将凉山彝族进步力量纳入党的革命统一战线体系之中。自此,彝族民众转变为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与支持者,热血的彝族青年主动追随红军参军作战,红军主力离开后,彝族武装仍持续开展反围剿斗争,举行“钻牛皮,吃血酒”誓师大会,提出“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外”的响亮口号,粉碎了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多次围剿。红军与彝族人民在革命中形成斗争对象一致、奋斗目标一致、革命立场一致的政治格局,正式建构起稳固的政治共同体,为最终走向深度交融铸牢认同根基。

(三)深度交融:生死守约凝聚精神命运共同体

彝海结盟能够跨越近百年岁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典精神符号,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以生命践行盟约、以世代传承初心,在利益互助、政治同盟基础上,最终升华为生死相依、永续传承的精神命运共同体。红军主力顺利过境彝区、完成强渡大渡河战略突围后,维系即时交往的现实条件已然消失。但小叶丹始终恪守彝海歃血为盟的庄严约定,将与红军的盟约视为族群与家国的终身承诺。在红军撤离后的数年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反动势力持续对凉山彝区开展清剿镇压,对小叶丹威逼利诱、残酷迫害。在极端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小叶丹始终初心不改,誓死守护红军队旗、秘密掩护掉队红军伤病员、坚持调和彝族家支矛盾、坚守彝汉团结初心,直至为守护盟约、捍卫民族团结献出生命。小叶丹以生命为代价,将一场临时革命互助升华为生死不渝的命运相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凉山彝族民众在红军绝境之际的鼎力相助,坚持传承彝海结盟凝结的民族团结初心,将平等团结、守望相助、生死与共的交往内核,贯穿党的民族团结工作全过程。历经近百年传承积淀,彝海结盟早已不再局限于近代凉山彝汉互动的历史个案,而是

凝练为各民族共有、共享、共传的红色历史记忆与精神文化符号,凉山先后建立彝海结盟塑像、彝海结盟纪念碑、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色纪念设施,并把结盟的故事改编为电影《彝海结盟》、舞蹈《情深谊长》等文艺作品,既体现了彝汉人民通过多样化的纪念形式持续巩固这份共同历史记忆,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四、结语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而彝海结盟是长征历程中闪耀着民族团结光芒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作为核心执行者——刘伯承坚守民族平等底线、秉持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地方民俗文化,以真诚沟通化解百年民族隔阂,构建起彝汉团结互助的良好格局,丰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统战工作实践。立足这一宝贵历史经验,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应赓续彝海结盟红色基因,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参考文献:

- [1]陈坤,刘倩.“彝海结盟”故事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6(6):58-65.
- [2]陈国光.“彝海结盟”的历史功绩及现实意义[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6):24-28.
- [3]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九日)[A].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C].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41.
- [4]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54.
- [5]阿呷子几,路淑静.彝海结盟——百年大党民族团结工作优良传统的回顾与展望[J].理论观察,2021(10):18-20.
- [6]苏静.沙马马海子与彝海结盟[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7(6):19-23.
- [7]沙马马海(木呷).红军过彝区“彝海结盟”回忆[A].石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C].石棉:石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24.
- [8]文彬.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A].刘统.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517-519.
- [9]刘伯承与果基约达彝海歃血结盟[EB/OL].[2009-1-14].<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671470.html>.
- [10]方素梅,周竞红.播种之旅: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80-81.
- [11]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70.
- [12]习近平.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N].人民日报,2024-10-1(1).
- [13]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4(2):4-18.
-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 [15]杨荆楚.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纪念“彝海结盟”六十周年[J].民族研究,1996(1):11-16.
- [16]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the Party's Ethnic Policy during the Long M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A Case Study of Liu Bocheng and the Yihai Alliance

LI Ke, SHI Wen-hui

(School of Marxism, Changji University,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The Long March period was a key historical stage in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ystematically carried out work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and implemented the principle of ethnic equality. As a landmark historical event in which the Central Red Army resolved ethnic barriers and implemented the Party's ethnic policy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e Yihai Alliance was an early successful practice of combining Marxist ethnic theory with the realities of ethnic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Long March, Liu Bocheng,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nt deep into the Yi-inhabited areas of Liangshan. With an attitude of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he swore a blood oath with Xiaoye Dan, the Yi leader, breaking the ethnic barriers created by rulers over successive dynasties. This governance experience, derived from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lso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continuously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ong March period; Liu Bocheng; Yihai Alliance; the Party's ethnic policy